

转轨时期的投資理论与实践

INVESTMENT THEORY & PRACTIC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S

张中华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南财经大学财政学博士点导师文集

转轨时期的投资理论与实践

张中华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南财经大学财政学博士点导师文集/吴俊培主编。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11.

ISBN 7-5005-4370-0

I. 中… II. 吴… III. ①财政 - 经济理论 - 文集 ②税收理论 - 文集 ③国有资产 - 经济管理 - 文集 IV. F81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698 号

中南财经大学财政学博士点导师文集

吴俊培主编(本卷著者 张中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hp.com>

e-mail: cfehp @ drc.go.net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发行处电话: 64033095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湖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2.75·印张 2 820 000 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武汉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全八册定价: 240.00 元

ISBN 7-5005-4370-0/F·3962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南财经大学财政学博士点导师文集

编 委 会

主 编：吴俊培

副主编：许建国 杨灿明(常务)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许建国 吴俊培 张中华 杨灿明

陈光焱 倪平松 赵 曼 郭跃进

序

中南财经大学财政学科创办于1948年，1952年院、系调整后，该学科点集中了当时中南地区大批优秀的财政专业师资和专业图书资料，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最早设立的财政学科点之一。1978年，学科点恢复招收本科生；1979年获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权；1993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1995年被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1997年被批准为财政部部属院校首批重点学科。

经过多年的教学与研究，本学科点已形成了以下几个主要方向：(1)财政基础理论与宏观财政政策。本方向主要研究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公共商品理论、公共财政职能、公共选择和公共部门效率等理论；研究财政运行机制、财政宏观调控体系与政府财政政策（包括投资政策、公债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国有资产管理等）等。目标是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理论体系、财政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及其决策支持系统。(2)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制度。本方向主要研究税收的功能及效应、优化税制、税收负担，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宏观税收政策及涉外税收政策等；研究中外税收法律理论、税收法律体系和市场经济下的税收法制问题。目标是建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税收理论、政策、法律制度及其决策支持系统。(3)中国财政制度变迁。本方向借鉴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我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理财思想发展与财政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研究历代财产、分配和政府财政制度的变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目标是完善我国财政史学体系，总结财政思想和财政制度的发展规律，为制定适合国

情的财政政策与制度,提供决策依据。(4)东西方财政比较。本方向主要进行中外财政政策与制度的比较研究,包括中外财政政策体系和决策方式的比较;中外税收、预算、国债、转移支付、国有资产、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等。目标是总结中外财政政策、制度发展的规律、经验和教训,为建立、完善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本学科点的主要学术贡献或主流思想是:第一,率先提出应把财政区分为微观财政和宏观财政两个分支,构建宏观财政框架;第二,提出公共商品是财政学中的核心概念,政治决策和市场统一的基础是效率市场等观点;第三,率先运用效用函数分析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包括决策效率和生产效率)问题。

在理论研究与教学方面,本学科点有以下主要特色:(1)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实践的重大课题和难点问题,进行高起点、系统的探索和研究,力求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和政策排斥市场机制的传统思路,以推动我国财政理论发展,为政府财政决策服务。(2)借鉴当代财政理论研究的新方法,尤其是要借鉴新古典主义的定量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的财政理论和现实问题,使研究成果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3)广泛吸收古今中外有益的财政思想和实践经验,通过古今结合、中西比较的开放式研究,吸取养料,解决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4)走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一体化的道路,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相结合、校内教师与校外专家协作研究相结合,使教学、科研成果尽快地转化为政府的财政、税收决策和企业的经营决策,形成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机制。(5)形成了以著名财政学者吴俊培教授为中心,学科带头人为主体,有其他学术骨干广泛参与的财政学研究群体,充分发挥本学科点的群体优势,集中力量承担、完成全国性的重大科研项目,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

目前,人类社会正准备迈步跨入新的世纪,知识经济的浪潮已扑面而来,本学科点也面临着进一步规划和建设的紧迫任务。我们的目标是,在巩固已有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级学科建设的要求,将本学科点建设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培养高层次、高质量财政、经济管理人才和解决国内重大财政、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的基地;在教学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现代教育管理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学科点将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八位博士生导师(或博导组成员)联袂出版这套导师文集,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对各位导师历年的成果加以整理,对主要的学术思想加以总结,对于加强本学科点的建设,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通过学术成果的体系化,将为本学科点今后形成独具特色的政策流派打下重要基础。文集中的许多成果都是对我国财政经济改革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的研讨,这对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将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出版这套丛书还旨在为培养硕士、博士生提供教学参考资料,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对于有志于财税理论研究的人士,以及渴望在这一领域继续深造的学子,阅读本套丛书都会有所裨益。

本套丛书的作者均在高校从事了多年的财税问题的教学与研究。我们根据各自的研究专长作了相应的分工。丛书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内容广泛,包括财政基础理论、税收政策与税收制度、外国财政与税收、政府投资行为研究、社会保障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中国财政史等方面。

在文集中,我们试图通过不同的角度透视生活中的财税问题,对人们所熟悉的一些现象作深入透彻的分析,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我们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与财政学的最新理论,尝试运用先进的理论工具,来总结历史、指导实践。在深化财税改革的今天,这种探索很有必要。但也正因为是探索,所以缺点和错

误在所难免，恳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在此世纪之交，我们把这套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并希望和读者们一道去继续发现真理，开创美好的未来。

编 者

1999年6月

自序

我于1978年2月考入湖北财经学院本科，主攻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专业，今年我所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生即将毕业，光阴荏苒，一晃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这二十余年，正好处于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时期。

经济体制的创新和变迁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经济运行模式，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激活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我十分庆幸自己遇上了这个伟大变革的时期。

按照认识事物的规律，理论来源于实践，思想的进程总跟随着现实的发展。我思考投资理论问题的心理历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也是紧密相连的。1978—1984年，在读本科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虽发表过几篇令自己陶醉一时的涂鸦之作，但主要精力还是用于了学习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1985—1988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投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我思想最为激动的时期。那时，经济体制改革进展迅猛，理论界异常活跃，受此影响，我时常产生一些思想冲动，按捺不住便提起笔来。1989—1991年，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我为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经历了一次艰难的思想磨练。1991年4月，我回到中南财经大学任教，改革过程中显露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使我多了几份冷静；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解脱，又让我多了几份从容的独立思考。

投资被萨缪尔森称作对经济“发号施令”的因素，阿克利则说：“几乎所有宏观经济理论中投资都占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迄今为

止,我国经济的潮涨潮落,始终与投资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年来,我一直将投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我将对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体制、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区域分布、资本市场和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节等问题上。但是,投资总是在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中运行的,为了追寻投资的运行规律,又不得不探讨一些更为宏观和深层次的问题。

在撰写每一篇论文时,我不曾想过构造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更没有想过将已经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我总是跟随着现实前行,有感而发。现在奉丛书主编之令,为尽一个博士导师之责,不揣谫陋将一些过时的东西重现在读者面前,确实诚惶诚恐。无论是否幼稚,是否自相矛盾,是否错误,都是自己研究的历史,思索再三,还是决定维持它们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编辑出版本书,中南财经大学的吴俊培教授、许建国教授、杨灿明教授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中国财经出版社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张中华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武昌

目 录

序

自序

一、经济体制与投资体制改革 (1)
1、国有经济的改革	(3) ——从绝对优势转向相对优势
2、论基本建设微观扩权与宏观控制问题	(10)
3、论国家投资的地位及其变化趋势	(17)
4、多重投资主体的制度规范与宏观调控	(24) ——投资体制深层改革的构想
5、关于社会主义初级积累模式的选择	(37)
6、当前改革的重点何在	(45)
7、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本控制	(51)
二、投资总量与经济增长 (61)
8、简论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	(63)
9、通货膨胀与国民收入分配及其使用结构	(71)
10、对我国投资膨胀若干问题的分析	(83)
11、信贷投资膨胀及其治理	(95)
12、近几年信贷投资规模的评价与分析	(107)
13、预算外投资：改革以来的变化、问题及对策	(117)
14、以外汇收支平衡制约投资规模	(142)
15、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合理化与投资规模的宏观控制	(156)

16、投资启动不宜重走老路	(164)
17、投资规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175)
18、论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的转换	(184)
19、构建需求激励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195)
三、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	(205)
20、论投资结构与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协调	(207)
21、论基本建设规模、结构和效果的综合治理	(218)
22、基本建设投资结构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227)
23、产业与投资结构优化可供选择的策略	(248)
24、产业与投资结构优化的困难及其对策	(258)
25、我国安排投资结构的基本经验教训	(268)
26、结构调整:经济通向协调发展的选择	(277)
27、从传统的非常规调整转向常规调整	(287)
28、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98)
29、协调生产结构与外贸结构	(313)
——开放条件下投资结构的宏观调节	
30、论政府对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有效管理	(324)
31、深化房地产体制改革,着力投资结构调整	(334)
四、投资分布区域经济结构	(339)
32、论华中经济区的发展和横向联合	(341)
——兼论同向经济区横向联合机制	
33、内陆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51)
34、广东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360)
35、论港、澳、台、大陆产业一体化及投资联合	(376)
36、香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及对大陆的启示	(388)
五、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资本市场的发展	(421)
37、我国资本区域流动的现状、走势及应采取的宏观政策分析	(423)

38、论我国长期资金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441)
39、走银企集团之路	(452)
40、商业银行：建设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选择	(464)
41、建设银行如何进行金融创新	(475)
42、我国股价的基本走势及调控方略	(485)
43、资产经营与企业产权交易	(496)
44、我国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504)
45、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530)

一、经济体制与投资体制改革



1、国有经济的改革

——从绝对优势转向相对优势

一、国有经济比重的回顾与比较

自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渐走向单一的公有经济，而其中国有经济又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如 1978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80.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 19.2%。这种单一的公有制完全脱离生产力低水平、多层次的发展状况，对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劳动者知识的充分发挥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近几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已从单一转向多元化。这种变化带来了我国城乡经济的活跃和繁荣。但目前国有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如 1986 年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占 63.7%，集体所有制占 29.2%，城镇个体经济占 0.3%，其他类型企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合营与外资企业比）占 1.8%；在交通运输货运量中，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为 78.1%，集体所有制 21.3%，其他类型 0.6%。国有经济比重显然比“二五”时期要高，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则更高。

在国有经济比重过高的情况下，单纯改革国有经济的经营方式难以使改革深入，企业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1978—1985 年，除个别年份外，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都比集体企业高。1986 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发生亏损的有 55537 个，占企业总数的 13.2%；亏损额 72.2 亿元，约相当于盈利企业盈利额的 7%。其中，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额为 54.5 亿元，占 75.3%。

有的同志则把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差的原因归结为企业还没有掌握真正自主权或企业预算还没有完全硬化。我认为,如果真的实现了企业充分的自主权和纯粹的硬预算约束,那么,这种经济形式不管叫什么名字,都将不是国家所有制。如果保持国有制不变,企业自主权和预算约束的硬化都将是有限度的。有的同志以股份制企业作为论据来证明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相对分离,从而可以在不改变国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企业的真正自主和硬预算约束。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在股份制企业中,股东享有制定企业章程、任免董事、批准年度报告的权力,董事会则负责企业的经营决策,企业经理的主要职能在于根据既定的目标发展和管理企业。而且股东还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来影响企业的经营,企业经营和投资的风险也是由股东承担的。可见,企业经理并没有充分的自主权。第二,股份制企业存在的前提是有多重投资主体。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那么这个投资者将要承担全部经营风险,该投资者的意志是要全部反映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的。只有在有多重投资主体的情况下,企业才不听从于某一个投资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国有企业唯一的投资者,政府要承担全部经营风险,企业就不可能有充分的自主权。同时,财产的所有权与经济上所有权也是不能分离的。离开了经济所有权的财产所有权只不过徒有其名。想让国家拥有财产所有权,而让企业拥有经济所有权,或者相反,都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其双重职能有关。纵观国有企业的历史,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都是基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经济相对平衡的双重目的建立起来的。因此,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盈利,而有更广泛的目标,诸如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瓶颈”部门的供给,增加社会公共福利。为一般企业的生产提供基础设施,等等。如果国有企业的比重恰好是维持经济相对平衡所需要的,那么这部分企业